

■ 文学研究

人格像似与镜像自我^①

——苏曼殊译介拜伦的文学姻缘论

李 静^{1,2}, 屠国元²

(1. 常州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2; 2. 中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苏曼殊的拜伦诗作出版后,深受读者欢迎,开拓了读者的眼界,激发了青年读者的革命热情。从人格视角观照苏曼殊与拜伦的文学关系,发现他们的人格像似缔结了一对绝佳的跨国文学姻缘。苏曼殊选择拜伦、接受拜伦、译介拜伦是借拜伦的人格镜像自我、表白自我、升华自我,释放自己的社会理想,表征自己的社会志向。

关键词:苏曼殊;拜伦;译介;文学姻缘;人格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3)06-0157-04

在中英文学关系史上,苏曼殊与拜伦可谓情投意合,他们的文学姻缘常被奉为佳话。本文拟从文学接受者的人格视角,挖掘被苏曼殊誉为“他的整个生命、经历和作品,都是用爱国和自由的理想编织起来的”^{[1]539}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进入他的接受视野的人格动因,并力图探明苏曼殊译介拜伦的文学姻缘中所蕴藏的社会志向表征。

一 跨国文学姻缘建构中的人格参与

众所周知,任何文学接受者都不会对所有的文学作品感兴趣,必定只有某些作家、某类作品才能诱发他的阅读冲动。毫无疑问,接受者的个性、气质、性格、才情、心理禀赋等人格因素会左右他对接受之本的价值判断。人格反映了一个人总的心理面貌,是相对稳定、具有独特倾向性的心理特征的总和,是人所特有的一种内在规定性,是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包括气质、性格、能力、兴趣、爱好、需要、理想、信念等方面内容。人格是个动力倾向系统的结构,不是被客观环境任意摆布的消极个体,它具有积极性、能动性,并统帅全部心理活动去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2]28}。所以,人格支撑着人的行为,驱动着人趋向或规避某种行为。通常而言,那些与接受者的人格近似或契合的作者及其作品,往往会得到肯定与接受。反之,则常常会遭遇否定与拒绝。究竟哪位作家、诗人及他们的哪部作品能够得到接受者的青睐,在作者与接受者之间建立起文学姻缘,往往都隐藏了接受者强烈的人格意识。

朱栋霖(1989)认为,文学“接受者总是以自己特殊的个性、气质为出发途径,去寻找与发现自己的精神近亲,他的审美心理构架在呼唤能与之达到新的契合的同构对应者”^{[3]165}。彭继媛(2009)从接受理论的角度也指出:“每一个接受主体都处在一个纵的文化历史发展和横的文化接触面所构成的坐标中。这个坐标对于每一个接受主体来说,可以具体表现为个人经历、知识层面、欣赏水平和审美情趣等方面。由于每一个接受主体的上述要素因人而异,所以在接受外来作家时,接受主体往往会选择那些与之相似的作家。因为只有这些作家才会引起他们的精神共鸣。”^[4]他们实质是在声明,文学接受者都具有内在的视野筛选机,如果作者的气质、才情、个性等适逢与自己的性格、爱好、审美心理等共鸣,就能透过这个视野过滤器,做自己的精神伴侣、人格近亲。以此理论审察苏曼殊译介拜伦的文学关系,可以发现他们是一对建立在人格像似基础上的绝佳的跨国文学姻缘,通过这美妙的文学姻缘,投射出苏曼殊的社会理想。

二 像似与契合:苏曼殊与拜伦的人格观照视点

苏曼殊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诗人、翻译家、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称之为“革命和尚”,他在人间只活了34个春秋,英年早逝。就翻译的成就而言,他译介过拜伦、雪莱、雨果等

① 收稿日期:2013-01-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7BYY010);2010中央高校经费重点课题(201024200038);湖南省社科基地委托项目(2011JD76);常州工学院科研基金重点项目(YN1233)

作者简介:李 静(1970-),男,江苏徐州人,副教授,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翻译学和译介学研究。

文学家的作品,他的译著曾以专集、合集、全集等形式一版再版,其中尤以拜伦译介最广,影响最大。那么,在众多外国诗人中,苏曼殊缘何会对拜伦着墨最多、用情最深而且被张定璜认为“唯有曼殊可以创造拜伦诗”^{[1]227}呢?我们认为,这主要是他们的人格像似性撮合了这份跨国姻缘。

苏曼殊是中日混血儿。生母若子,日本人,在他出生不满3个月之时,即离开其父苏杰生而一去不复返,于是苏杰生将他交其妾河合氏(日本人)抚养,苏曼殊便认河合氏为生母。为此,他常说自己的身世有“难言之恫”。他6岁回到广东老家,受其嫡母虐待,常被他人骂作“东洋野种”,倍受族人冷嘲热讽。有研究者探讨了他的人格双重性,并道出了与拜伦人格的像似之处:谈到苏曼殊的人格冲突,就不能不提到同样有着双重人格的拜伦。如果把他和拜伦放在一起比较,我们会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似相通之处非常多。拜伦幼年时父母离异,早期的储爱槽与苏曼殊一样匮乏。拜伦生性高傲且忧郁,他的早期诗作多透出对周围庸俗环境及上流社会的轻蔑与鄙视。而苏曼殊也是既高傲而自卑,常感叹道:“我誓不居此五浊之世。”拜伦的“革命者兼诗人”的身份与苏曼殊相似。拜伦的思想深处时时闪烁着对于“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的憧憬,而苏曼殊则在头脑中也构建了类似的“梵天净土”式的世外桃源^[5]。

弗洛伊德和荣格等精神分析学者一致认为童年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时期,早期环境影响以及历史遭遇对人格发展具有深远的、不可逆转的作用。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认为,从童年时期开始,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自卑感,而自卑感又是人格发展的动力。儿童在与成人的比附中感到自身的无能,进而会激发一种获取能力的渴望:希望自己具有更多的男性气质,变得更有力量。阿德勒把这种对自卑感的对抗叫做“补偿作用”。他还把自卑感与身体的缺陷联系起来,认为“身体器官有缺陷的儿童在心灵的发展上比其他入蒙受了更多的阻碍”^{[6]72}。显然,苏曼殊和拜伦在阿德勒自卑情结学说的观照下,无疑是最为典型的写照。拜伦天生跛足,“病”在身体;苏曼殊终生不忘“难言之恫”,“病”在心理。拜伦因反抗专制而被迫离开祖国,苏曼殊则因中日混血儿的身份,屡遭族人冷眼而四处漂泊。这决定了他们必然具有一般人所不具有的更多的自卑感,因而在对抗自卑时就更渴望得到异乎寻常的补偿作用。儿时的自卑铸就了他们无穷的人格力量,让他们嫉恶如仇。这就是阿德勒所说的为优越而奋斗的行为。后来他们二人都成长为追求自由、反抗暴政的勇士。

苏曼殊反对清朝的封建统治,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1903年参加拒俄义勇队,亲赴东北,抗击俄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他还参加进步革命团体的活动,与同盟会等革命团体的领袖情同手足,甚至曾想枪杀保皇派康有为。他还撰写革命文章,刊发在许多革命报刊上,宣扬革命精神。在19世纪的欧洲,拜伦是伟大的革命家。为了自由、为了民权、为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他浴血奋战在革命的最前线。他用行动捍卫着法国大革命的伟大理想,践行着革命的理念,与一切奴役人民的暴君斗争到底,推翻封建专制主义和贵族寡头的反动统治。为了援助希腊人民的革命事业,他变卖了全部家产,亲赴希腊,指挥战斗,最后战死希腊。歌德和普希金分别盛赞他为“19世纪最伟大的天才”和“思想界的君主”。

每当苏曼殊情绪低落时,他便从拜伦的诗篇中寻觅知音,乃至于月夜泛舟湖上,颂读拜伦诗作,“歌已哭、哭复歌”,致使“舟子惶然,疑其为神经病作也”^{[7]108}。彼此悲怜的身世、人格气质的契合与像似让苏曼殊相交拜伦,选择拜伦,译介拜伦,镜像自我。

三 钟情拜伦与译介拜伦:人格像似与契合视点下苏曼殊与拜伦的文学姻缘

翻译首先始于译者的翻译选材。傅雷先生特别强调说:“选择原作好比交朋友:有的人始终与我格格不入,那就不必勉强;有的人与我一见如故,甚至相见恨晚……,倘若明知原作者的气质与我的各走极端,那倒好办,不译就是了。”^{[8]191-192}仔细品味可知,傅先生的真知灼见体现了形而上的哲学思辨,深切地蕴含了译者与作者的人格像似在缔结文学姻缘中的重要作用。这种文学姻缘不是随意的组合,是由翻译做“媒”,建立在译者人格与作者人格性情像似与契合基础上的“婚配”。“翻译者与所译作品之间,应该有一种前定般的‘缘分’。”^{[9]286}因此,“翻译成功的前提,是找到与自己精神气质最相契合的对象,是与能够激发自己‘翻译冲动’的作品相遇。”^{[9]286}郭沫若与雪莱的文学姻缘就是典型的例证。郭沫若说:“译雪莱的诗,是要我成为雪莱,是要雪莱成为我自己。……男女结婚是要先有恋爱,先有共鸣,先有心声的交感。我爱雪莱,我能感听得他的心声,我能和他共鸣,我和他结婚了。我和他合而为一了。”^{[10]261}不光郭沫若译雪莱如此,苏曼殊与拜伦的文学姻缘也有一种前定般的“缘分”。就像郭沫若译雪莱是要成为雪莱一样,他译拜伦是要使他自己成为拜伦。

相近的身世与命运,相似的理想与追求,相同的浪漫主义气质紧紧地吧苏曼殊与拜伦的心捆绑在一起。1906年,苏曼殊在日本与母相聚之时,适逢与拜伦“邂逅相遇”。感于与他相似的身世、背井离乡的命运,不禁悲感交集,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苏曼殊十分欣赏拜伦的人格气度:不管是英姿飒爽、多情浪漫的青年拜伦,还是侠肝义胆、谋人家国的革命者拜伦,还是际遇飘零、沦落他乡的流浪者拜伦,抑或才高八斗、英年早逝的诗人拜伦,苏曼殊从拜伦身上发现的更多的则是他自己,“他在这位高贵、热情、坦诚的异域诗人那里寻到了真正的心灵契合”^[11],同是天涯沦落人。正是出于对拜伦人格的崇拜,他在“春序将谢,细雨廉纤”的季节,展诵《拜伦集》^{[7]254};当他得知刘半农等要建立拜伦学会时,马上兴奋地表示:“如借大雅倡之,不慧(苏曼殊自称)欣欢顶礼,难为譬说矣。”^{[7]229}他甚至还打算在“欧洲大乱平定之后”,“振锡西巡,一吊拜伦之墓”^{[7]220};可以想象,倘若没有像似的人格气质,没有灵犀相通的心灵默契、没有精神意蕴的微妙契合,拜伦恐怕难以走进苏曼殊的人生世界,也很难会被他视为知己。我们可以从他《题拜伦集》(1909)的诗句:“秋风海上已黄昏/独向遗编吊拜伦/词客飘蓬君与我/可能异域为招魂”^{[1]539}窥见他于拜伦“同命相怜”的人格互文:慨叹二人漂泊异乡的相同际遇,并从拜伦那里汲取了一种异域的精神滋养,让自己在寂寥的人生旅途中感到心理的慰藉。这其中表现出的“宏阔的意境,慷慨的情怀,热烈而悲壮的情绪,实在是出自他与拜伦精神上的深刻理解与契合”^{[12]227}。苏曼殊怀着对拜伦的深厚热情,译介了他的《哀希腊》《去国行》《赞大海》

《答美人赠束发徽带诗》《留别雅典女郎》等诗篇,1909年在东京编为《拜伦诗选》,1914年出版,到1922年已发行4版。《拜伦诗选》的出版缔造了“为某一外国作家的作品单独出选集的,也唯有苏曼殊《拜伦诗选》而已”^[13]的佳话,也使得苏曼殊成为“介绍拜伦文学给中国的第一人”^{[1]181},对拜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产生了巨大影响。至于苏曼殊本人,“他爱拜伦,爱拜伦和他相像”^[14]。诗词之中,他以“中国的拜伦”自许,生活之中,处处效仿拜伦。

四 作为镜像自我的拜伦:文学姻缘表象下苏曼殊的社会志向表征

关于苏曼殊对拜伦的心仪和热情译介,时人张定璜曾如是评价:“教中国晓得 Byron(拜伦),曼殊内心里也想教中国晓得他自己。”^{[15]147}也即是说,苏曼殊译介拜伦不唯独是出于文学交流,其实还有一个深藏的目的就是借对拜伦的译介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表征自己的社会志向。他选择拜伦,接受拜伦,译介拜伦是以拜伦镜像自我,表白自我,升华自我。

苏曼殊与拜伦的文学姻缘完全是出于他被拜伦人格之美所诱发的感情共鸣。拜伦诗文处处散发出高尚的人格之美。无论是“我为希人羞/我为希腊哭”(见《哀希腊》),还是“宁可让这右手永远枯瘦/但我们的圣琴决不为异族弹奏”(见《在巴比伦的河边我们坐下来哭泣》),抑或“谁要想自己获得自由/必须自己起来斗争”(见《哈尔德·哈洛尔德游记》),这些华美诗句都从字里行间透视出诗人拜伦雄伟傲岸、追求自由、颇具穿透力的高尚人格,放射出诗人拜伦用生命义助希腊独立的人格魅力。苏曼殊正是被匿藏了拜伦人格的铿锵有力的诗章所深深震撼,从而激发了他的译介热情,与拜伦相知相爱。对于拜伦的诗作,苏曼殊说:“拜伦的诗象令人兴奋的美酒——喝得愈多,其醇香就愈令人着迷。他们从头到尾充满着魅力,充满着美,充满着赤诚。……拜伦有一颗高贵而桀傲的心。……他把全部生命、事业和作品,都奉献给了爱情和自由。”^{[1]225}可见,“作为一个诗人,曼殊最尊崇的是他那追求自由和爱情的高贵的人格。”^[16]苏曼殊的人格气质中贯穿着他对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的狂热追求,所以能以独到的诗心来体认拜伦,体察到了拜伦热情澎湃的诗文风格之中所隐匿的追求自由的人格气质。拜伦人格气质中那种对专制社会的猛烈批判以及对自由的强烈渴望,正是浸淫在腐朽的晚清时代的诗人苏曼殊的心声。同样富有谋人家国人格气度的苏曼殊,亦曾身处革命的激流之中,对拜伦义助希腊独立的壮举定然比他人感悟更深,自然会和热情奔放的拜伦发生“感应”。“他在文学翻译,尤其是对拜伦的诗歌翻译中所表达的,则是他的‘人格理想’——他对拜伦诗歌中所表现出的那样一种他所不具有的精神状况、人格态度的向往。”^[13]

拜伦一直关注着希腊人民争取独立自主的解放事业。1810年,他在游历希腊时,翻译了希腊爱国主义诗人、革命烈士里加斯(1757-1798)谱写的诗歌《希腊战歌》。里加斯的诗句以燃烧的激情感染着一直要求砸碎封建专制、追求自由的拜伦。13年之后,即1823年,诗人拜伦直接投身到希腊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去,1824年不幸葬身军营。他的诗中诗《哀希腊》是激励希腊人民起来战斗,驱赶外族统治

者土耳其的革命诗篇。在拜伦精神人格的激励下,苏曼殊怀着强烈的冲动热情地译介了拜伦的《哀希腊》,希冀借他山之石,唤醒神州,光复中华。他是借哀希腊而哀中国,用拜伦诗表达曼殊情,镜像自我,表征革命志向。自诩为“中国拜伦”的苏曼殊心中一直坚守着爱国的气节,曾一度是其友人的刘师培叛变了民主革命,他对之痛心激愤;传言他的师友章太炎变节,他立刻对其进行严厉的指责。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是,革命的果实却被阴险狡诈的袁世凯篡夺,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宣布复辟,恢复帝制。对于袁世凯倒行逆施的称帝行为,追求民主、崇尚自由的苏曼殊义愤填膺,怒气冲天,连夜起草了“讨袁檄文”,1913年7月21日在以“提倡国民独立精神、培植国民独立思想、建立独立之民族、保卫独立之国家”为宗旨的清末民初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官方”报纸《民立报》上发表,斥责袁世凯为“独夫”。他以拜伦的光辉事迹起兴说:“昔者,希腊独立战争时,英吉利诗人拜伦投身戎行以助之,为诗以励之。”^{[17]337}他鼓励国民以拜伦援助希腊独立的精神为榜样,作为征讨这位“作孽作恶”的“独夫”的行为动力,并象当年准备刺杀蜕变保皇派的康有为一样,他甚至准备亲自刺杀这位复辟狂。

拜伦的《哀希腊》给了苏曼殊斗争的勇气,他的《去国行》《赞大海》等爱国诗篇的译介又给了苏曼殊孤寂的心灵以深深的慰藉和革命的力量。苏曼殊因为中日混血儿身份在童年时期的遭遇给他的一生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对日本母亲的思念及其对儿时在日本生活的眷恋和对祖国中华民族深深的向往,让他常在日本与上海之间来回往返,这种生活的窘境、这种矛盾的心理让他对《去国行》的诗句“此行任所适/故乡不可期”、“欣欣荒野窟/故国从此辞”有着特别的感受。思及自身的悲怜身世和自己的革命志向,他感到慰藉,也感受到革命力量的源泉。总之,“回顾拜伦几首重要的译诗如《赞大海》《去国行》《哀希腊》中流露的思想情调,我们可以看到,苏曼殊在诗歌翻译中所寄托的人格理想,……于世有昂扬热情的态度,于家有所实际作为的事业,于己有所依托爱眷,不受阻绊的情感,和一种大气澎湃的气魄。而拜伦其人其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契合了他对人生的期待。”^[13]苏曼殊作为追求自由、追求民主的浪漫主义诗人和爱国人士,在“近代以来,外患日剧,整个社会面临着险恶的国际局势”^[18]的民族危亡时分,译介拜伦颂扬自由、独立、解放的革命诗篇成为其精神的寄托、心灵的慰藉、人格的镜像与行动的指南。“处于新旧之间的知识分子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们中的大部分在政治与文化之间徘徊,最终大部分走上了以思想改造文化的路。”^[18]苏曼殊就是这样一位以思想改造文化,并亲历革命行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知识分子。他对拜伦伟大的政治抱负和高尚人格仰慕不已,不由自主地感叹道:“善哉拜伦!以诗人去国之忧,寄之吟咏,谋人家国,功成不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1]125}这感叹是对拜伦人格的赞许,也是对自己人格的张扬,是两人人格的互文写照。可以说,苏曼殊亲近拜伦、选择拜伦、接受拜伦、译介拜伦是要在拜伦的身上聊慰自我,寻找自我,表白自我,升华自我。“他完全沉醉于拜伦个人人格气质中”^[11],完全沉溺于彰显拜伦人格的诗歌之中,与拜伦感同身受,抒发自己的情感,宣

泄自己的情怀,释放自己的理想,表征自己的志向。这是他人的人格镜像、人格审美、人格现实化与社会化。

五 结 语

“拜伦以一股令人震撼的狂飙之势挟裹着革命浪漫主义席卷了20世纪初的华夏大地,中国的文人学者莫不为其人格、行为及诗作所折服。在这样的热潮下,苏曼殊读了拜伦的作品,仰慕他的志向,并将拜伦视为异域知音。”^[19]本文探究了苏曼殊选择拜伦的人格动因,揭示了在文学姻缘表象下,苏曼殊借拜伦人格镜像自我、表征志向的心路历程^[20]。苏曼殊接受拜伦、译介拜伦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他们的人格像似铸造了这份完美的跨国文学姻缘,让英国诗人拜伦遇见了表白自己理想的东方知音,让中国诗人苏曼殊找到了宣泄自己心声、表征自我志向的西方代言人。

参考文献:

- [1] 柳亚子. 苏曼殊全集(第4卷)[M]. 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85.
- [2] 杨秀莲. 论人格的文化生成[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7.
- [3] 朱栋霖. 接受影响:审美个性的选择[C]//钱林森. 中外文学姻缘.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4] 彭继媛. 惠特曼《草叶集》在中日接受差异比较[J]. 怀化学院学报,2009(7):79-83.
- [5] 邢博. 解读苏曼殊的人格之谜[J]. 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5(1):81-84.
- [6] 罗玉林. 阿德勒人格心理学[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 [7] 苏曼殊. 曼殊大师全集[M]. 上海:上海教育书店,1946.

- [8] 傅雷. 傅雷文集·文艺卷[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
- [9] 王彬彬. 翻译是一种相遇[C]//许钧. 翻译思考录.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 [10] 陈福康. 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 [11] 卢晶晶,张德让. 从审美活动的自律性和他律性看苏曼殊对拜伦诗的译介[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6(1):33-38.
- [12] 杨联芬. 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 [13] 苟欢. 生命真实与人格理想的分野——苏曼殊创作与译诗[J].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4):89-93.
- [14] 戴从容. 拜伦在五四时期的中国[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63-67.
- [15] 张定璜. 苏曼殊全集·苏曼殊与Byron及Shelley[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 [16] 陆草. 苏曼殊与拜伦、雪莱之比较[J]. 中州学刊,1987(4):73-77.
- [17] 王学庄,杨天石. 南社史长编[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 [18] 吉雅杰,吴园林. 论社会变迁与知识分子的角色[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29-35.
- [19] 余辉. 苏曼殊与清末民初的“拜伦热”[J]. 阅读与写作,2008(8):43-44.
- [20] 乔国强. 试谈文学的界面研究[J]. 外国语文,2012(5):5-7.

On the Literary Marriage between Su Manshu and Byr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rsonality

LI Jing^{1,2} & TU Guo-yuan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213002,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cludes that it is the nearness of personality which makes a perfect transnational literary marriage between Su Manshu and Byron. Su Manshu's choice and acceptance of Byron is, in essence, to mirror, express and sublime himself and to project his social will on the stage of Byron's personality.

Key words: Su Manshu; Byron; translation; literary marriage; personality

(责任编辑 朱正余)